

成吉思汗神话:13~19世纪蒙古族史传文本思维结构解析

包红梅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神话式思维往往以叙述故事的形式,象征地表达着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成书于13世纪的《蒙古秘史》深受萨满文化影响,其中关于成吉思汗的神话与17世纪受藏传佛教影响的史著相关内容大不相同,然而在思维结构上却一脉相承,它们赋予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以神圣光环,借以重构成吉思汗伟大、神圣形象,希冀激发和振兴蒙古人的文化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关键词:成吉思汗;神话;蒙古族;史传文本

中图分类号:I207.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2017)02-0133-05

众所周知,神话作为特定时空环境中人类思维和文化的产物,能够反映文化规范或思维模式中人类活动的基本态势。一个民族是以分化了的思维,或理性地或审美地或宗教地对待神话,还是依然将神话或神话的思维方式有意无意地“整合”于自己的文化中,实际已显示了其文化的不同与思维结构的差异。公元13世纪,蒙古族以统一的蒙古汗国的身份登上了当时中国风生水起的政治舞台。作为13世纪真实的历史人物的成吉思汗从蒙元帝国的太祖升华为蒙古民族共同信奉的圣祖,进而成为固着在蒙古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的具有根基性和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这一演化的具体过程在13世纪至19世纪蒙古文学文本的思维结构中显得尤为清晰。

《蒙古秘史》是13世纪蒙古族将旺盛精力和充沛元气转化为文字的首部史传巨著^[1]。全书共计12卷,从卷1第59节开始,直到卷12的第268节,以大量篇幅记述了成吉思汗从诞生到逝世,征伐战斗的一生。《蒙古秘史》众星捧月式的叙事结构模式影响了其后的蒙古史传文本和文学文本。笔者认为,13世纪政治元气最为旺盛的蒙古民族在1240年收获的第一部书面史传巨著《蒙古秘史》在深层结构上,应与当时蒙古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同构。

《蒙古秘史》内容分为三部分:成吉思汗先祖的谱系;成吉思汗一生的活动历史;窝阔台汗的活动历史。全书中唯一与帝王有关的预言出现在成吉思汗的第十二世祖朵奔篾儿干的妻子阿阑豁阿“感光生子”的神话中。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神话存在的一切神圣性,归根结底源于本源的神圣性。神圣性并不直接依附于既成物的内容,而是依附于它产生的过程。不依附于它的性质和属性,而是依附于它过去的创始。把某个特定内容置于时间间隔之中,把它置于历史的深层之中,这样,它就不仅被确定为神圣的,具有神话和宗教意义的内容,而且也被证明的确如此。”^{[2](119)} 笔

收稿日期:2016-12-12

作者简介:包红梅(1972-),女(蒙古族),内蒙古通辽人,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

者认为,正是这一段略显突兀而又神秘的著名神话提出了一个令人神往的元问题——成吉思汗家族的超自然起源,从而为整部《蒙古秘史》的创作思维奠定了基调,使全书的思维布局框入了因果相证、前后相应的逻辑结构。

《蒙古秘史》第17节写道:“朵奔蔑儿干死了的后头,他的妻阿阑豁阿又生了三个孩儿。一个名不忽合塔吉。一个名不合秃撒勒只。一个名孛端察儿。”^{[1](917)}据实而论,《蒙古秘史》中阿阑豁阿生活的时代已属公元八九世纪,人们早已明白只有男女结合方能怀孕生子的道理。正因为如此,阿阑豁阿在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又生了三个孩子,便遭到头两个儿子和亲人的非议。阿阑豁阿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别古讷台、不古讷台您两个儿子疑惑我这三个儿子是谁生的,您疑惑的也是”^{[1](918)},接着她解释道,“您不知道,每夜有黄白色人,自天窗门额明处入来,将我肚皮摩挲。他的光明透入肚里去时节,随日月的光,恰似黄狗般爬出去了。您休造次说,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1](919)}。随即,这位用心良苦的母亲用“一只箭杆易折,五只箭杆束在一处,他人如何容易折得折”的生动道理训诫五个儿子要团结一心。接下来的叙述中一字未提两个大儿子的态度,只写了阿阑豁阿死后,“兄弟五个的家私,别古讷台、不古讷台、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四个分了,见孛端察儿愚弱,不将他做兄弟相待不曾分与”^{[1](919)}。由此推断,两个儿子接受了母亲的解说,也承认了三个弟弟的存在事实。可见,这里重要的不是这段神话传说的原始荒诞,而是这段神话传说所牢固具有的深厚文化心理背景和思维模式。

《蒙古秘史》既然在开篇部分已让阿阑豁阿老祖母提出了神话式的超自然起源的问题,就需要在后文中解决。而这佐证的任务就直接落在了她的第十二代嫡孙、《蒙古秘史》成书之时已经贵为大蒙古国成吉思汗的铁木真身上。众所周知,在神话思维中,以“象”为“征”是最为常见的思维模式。13世纪的蒙古人也同样沿袭了这一思维传统,并用在成吉思汗人生中最关键的两个事件——诞生和登基,借以证明阿阑豁阿“显是天的儿子,不可比做凡人。久后他每做帝王呵,那时才知道也者”的古老预言。

《蒙古秘史》第59节记述了铁木真神奇的降生:“也速该巴阿秃儿的妻子诃额仑怀孕于斡难河边,迭里温孛勒答黑山下生子太祖。太祖生时右手握着髀石般一块血,生了。因掳将帖木真兀格来时生,故,就名帖木真。”^{[1](930)}第60节写道:“诃额仑生了四个儿子,一个帖木真、一名合撒儿、一名合赤温,一名帖木格,一个女儿帖木仑。帖木真九岁时,合撒儿七岁,合赤温五岁,帖木格三岁,帖木仑女子正在摇车内有来。”^{[1](930)}可见,诃额仑母亲的子女中,只有长子铁木真出生时伴有“异相”。虽然那血块在铁木真后来艰难困苦的奋斗经历中似乎并未带来实际利益,但是,其“贵征”或“英雄”的象征无可置疑。

《蒙古秘史》第121节通过众民信奉的大萨满豁尔赤的神诰佐证了成吉思汗击败政敌,统领全蒙古的神圣性和正当性:“因神明告的上头,教我眼里见了……有个无角犍牛拽着个大帐房下椿,顺帖木真行的车路吼着说道,天地商量着国土主人教帖木真做。我载着国送与他去。神明告与我,教眼里见了帖木真。我将这等言语告与你。你若做国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帖木真说,我真个做呵,教你做万户。”^{[1](959)}后来的事实证明,成吉思汗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将这位“无功可纪”的豁尔赤“封以万户”。第123节记叙:“阿勒坛·忽察儿、撒察别乞众人共商量着,对帖木真说,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得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财,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这般盟誓了,立帖木真做了皇帝,号成吉思。”^{[1](960)}虽然这里无任何文字明示铁木真称帝来自豁尔赤的神谕,但是记述的前后顺序很容易启示读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豁尔赤神奇预言的影响力上。

《蒙古秘史》以“象”为“征”的神话思维除了显现在上述间接的例证之余,还投射在成吉思汗形象的具体描绘上。《蒙古秘史》第62节借助翁吉剌氏人德薛禅之口说九岁的铁木真“眼明面光

有”^[1](931)]。显然,这般“眼中有火,脸上有光”的容貌气质应属聪慧精明之相,也是富贵神勇之特征,可与铁木真与生俱来的种种贵征相呼应。铁木真毕生的统一大业征程中,在纳忽山消灭自恃强大、目空一切的乃蛮部是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战役。值得玩味的是,《元史》《史集》《多桑蒙古史》等多种蒙古史著中对这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战役的记述是典型的正面手法。如《元史》记载:“是日,帝与乃蛮军大战至晡,擒杀太阳罕。诸部军一时皆溃,夜走绝险,坠崖死者不可胜计。”^[3](13)]唯有《蒙古秘史》运用文学手法,通过乃蛮联军札木哈与乃蛮塔阳罕的战前对话,用夸张的语言不仅生动塑造了势如破竹冲锋在前的四员大将和合撒儿钢嘴铁牙的凶猛形象,更借助札木哈之口描绘出一位令人瞠目结舌的成吉思汗:“那如贪食的饿鹰一般垂着流涎,张开尖嘴冲上前来的……他的全身用生铜炼成,就是用铁锥去扎,也找不出空隙;他的全身用精铁锻成,就是用钢针去刺,也找不出狭缝”^[1](851)]。

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秘史》之后的蒙古族诸多文史著作中再无如此原始狰狞地比喻和描绘成吉思汗及黄金家族成员,即使是蒙古民间文学最负盛名的《江格尔》《格斯尔》等以夸张、比喻见长的英雄史诗作品中也未出现。笔者认为,这段“杀人于无形”的诡异比喻的神奇功效潜藏着更为深层的背景原因。这种神话式思维方法之所以经千年而不衰,自有其特定文化固有的生命力。这力量既源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外在诸因素,也有文化心理、民族气质、思维结构等内在诸因素。我们要做的只是把它的存在作为一种事实去刻画,而无须做出进一步的价值判断。

《蒙古秘史》通过记叙事件和形象化的思维程序构成原始神话思维的主体性结构,以民族英雄为历史过程的载体,将历史进程与人的精神领域衔接,通过历史主体完整的精神风貌,彰显人的思想、心理和性格在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蒙古史学和文学定下英雄主义历史观的基调。

二

17世纪初,后金政权的崛起给蒙古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蒙古史学家们陷入了对政治教训和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中。新的社会语境也激活了沉寂二百年的蒙古族历史文学的创造力,《黄金史纲》《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作品相继问世。

固什喇嘛罗桑丹津的鸿篇巨制《记古代诸王奠定的国家制度之著作简要汇总黄金史纲》^[4](简称《罗·黄金史》)自问世以来,广泛流传于蒙古地区,对蒙古民众的史学普及和同时代史学家的著史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罗·黄金史》由三部分构成:印度史;西藏史;蒙古史。它直接吸收《蒙古秘史》的蒙古史部分,既记述了蒙古族起源、黄金家族谱系及成吉思汗生平事迹,也补充了明代蒙古内部和黄金家族的内讧以及达延汗统一蒙古、阿拉坦汗引入藏传佛教等历史事件。显然,《罗·黄金史》在内容构成上仍延续着由《蒙古秘史》始创的集历史性、纪传性和文学性于一体的史传传统风格。然而,正是从这部《罗·黄金史》开始,蒙古人的祖源上溯至印度—西藏王统,这一新的史学动向直接影响了其后的《蒙古源流》等诸多历史著作。

鄂尔多斯名门贵族萨囊彻辰撰写的《蒙古源流》^[5]是17世纪另一部重要的蒙古历史文学名作。它在体例上更加接近编年史规范的史传,以纪年顺序系统记载了成吉思汗征伐除克烈、乃蛮等大部落之外的蒙古高原其他部落的事迹,填补了《蒙古秘史》的缺憾和中世纪其他蒙古文史著的遗漏。《蒙古源流》的结构设计遵循17世纪蒙古文史书所通用的印—藏—蒙—统相承的叙述模式,在卷首部分有详细的有关宇宙生成、人类起源的内容。全书由七大部分组成:宇宙生成、人类起源;印度王统史;西藏王统史;蒙古汗统史;满洲皇统史;跋文;79节格言诗。据实而论,在佛教创世说和印—藏—蒙—统论的思想指导下写就的前三部分的内容与蒙古史本无关系,但被作者视为蒙古汗统史必不可少的前史部分,费墨不少。

17世纪复兴史传传统的《罗·黄金史》《蒙古源流》与史传创始之作《蒙古秘史》在史学内容、文学手法、思想精神等方面的亲缘关系是毋庸置疑的。就指导思想和审美取向而论,《罗·黄金

史》和《蒙古源流》与藏传佛教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不容置辩的。笔者认为,从思维学的角度解析这两部史传文本的创作思维结构,通过论证它们与《蒙古秘史》潜藏的神话思维结构的承袭、发扬的顺接关系,为蒙古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的渊源提供佐证是有益的学术尝试。

从记叙事件的思维程序和形象化的思维程序共同构成的思维主体性结构来看,《罗·黄金史》《蒙古源流》与《蒙古秘史》比较,新增添的内容突出体现在蒙古族源的外延和成吉思汗形象的神圣化。这种思维结构的新趋向与17世纪蒙古史学家们所面对的历史语境和社会问题存在直接关系,与他们的认识水平、知识构成和心理期待同构。深究其内在原因,仍与《蒙古秘史》肇始的思维规范和精神诉求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传统的原始神话思维与外来传入的宗教思维相契合,构成了17世纪蒙古史传文本独特的神话宗教思维,从而为凝聚蒙古民族文化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我们知道,早在7世纪时,蒙古人口口相传蒙古部落祖先阿阑豁阿“感光生子”的神奇事迹及其后裔诸部的奋斗业绩都记录在《蒙古秘史》中。经过数世纪的史学断档,17世纪蒙古史学家们在恢复蒙古史传传统的过程中,在藏传佛教的猛烈刺激下,把祖先族源牵强附会至印藏王统和佛教偶像上。在他们的笔下,蒙古族古老记忆中的祖先阿阑豁阿“感光生子”的神奇事迹和太祖成吉思汗“右手握血块诞生”的异象也得到了理性化、世俗化的修改。《蒙古源流》第3卷写道:“(阿兰·果火)她生下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两个儿子。脱奔·咩哩健去世了。后来,阿兰·果火哈屯每天夜里都梦见一个漂亮的男孩子模样的人与她共寝,第二天天一亮便出[门]而去。[她把这梦]常讲给妯娌们听,久而久之,寡居着生下了博寒·葛答黑、博合睹·撒里直和孛端叉儿·蒙合黑三个儿子。”^[5](96)]面对两个大儿子的质疑,“她把先前那个梦的原由整个讲了一遍,又说:‘由此看来,你们那三个弟弟很像是天神之子。现在,如果你们五个人不和睦,各行其是,就会像前面那些单支箭一样,独自一人就能吃掉[你们];如果共同行动,就会像后面那束箭一样,即使是众人也不能战胜。’”^[5](96)]太祖成吉思汗的诞生也正常化为“从先前那个戊子年以后经过三千二百九十五年, [是]壬午年,也速该·把都儿父亲和月伦母后二人生下了一个妙相俱足的儿子。因为当时正逢 [也速该·把都儿]俘获了塔塔儿的铁木真·斡怯归来,所以就给儿子取昵名:天赐的铁木真”^[5](105)]。显然,这种与《蒙古秘史》潜在的原始神话意识相矛盾的处理方式说明,17世纪蒙古人文化心理中逻辑思维和理性思维已胜过了原始神话思维。

受藏传佛教黄教教义影响,《罗·黄金史》和《蒙古源流》等史传作家致力于蒙古汗统史与印度、西藏王统史的嫁接,形成了17世纪崭新的蒙古佛教史学观。在萨囊彻辰的笔下,蒙古王统与古代吐蕃颈座王下传七代的海穴后侧金座王有嫡脉血缘关系。在《蒙古源流》中,成吉思汗的远祖孛儿帖·赤那成了古代吐蕃金座王流亡异地的第三子。他携带妻子豁埃·马阑勒渡过腾吉思海,至不儿罕·合勒敦山下,被巴塔人推举为首领。这些巴塔的蒙古人认为:“这是个有根脚人家的子嗣,我们没有首领,可以奉他为那颜。[就这样]奉戴他作了那颜,一切遵照他的旨令行事。”^[5](89)]显然,从创作思维意识来看,无论是《蒙古秘史》中“奉上天之命而生”的蒙古祖先孛儿帖·赤那,还是《黄金史》《蒙古源流》中“有根脚人家的子嗣”蒙古祖先孛儿帖·赤那,其证明成吉思汗及其家族起源的神圣性的想法是相同的。蒙古史学家们借助外来佛教文化深奥精髓的内涵和瑰丽恣肆的想象表达,巧妙地完成了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结构中传统思维的提升与拓展。

自北元政廷退居朔漠,安于一隅的塞外蒙古人在政治命运、经济命脉、社会结构和文化遗产等方面均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故。从统治民族到仰人鼻息的身份颠覆,对蒙古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以及伦理价值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的精神气质、情感模式和心性结构,也改变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面对外部世界的基本态度。他们顺应社会流行趋势,通过印藏王统与蒙古王统的嫁接,试图以令人尊重的神谱和家谱的方式暗示一种尊贵的社会契约,从而在与外族的利益之争中起到提升民族自尊心的作用。

在深受萨满教思想影响的蒙古人看来,代代口耳相传的阿阑豁阿“感光生子”的事迹是真实可信的,是成吉思汗祖先与共同信仰的“长生天”之间存在特殊亲缘关系的口实明证。而《蒙古秘史》共有 17 处内容涉及萨满教“长生天”崇拜事项,但丝毫没有把成吉思汗视同“长生天”或“长生天”嫡脉子嗣或赋予神相异禀的诡异记载。在《罗·黄金史》《蒙古源流》等史传著作中,史家们有意凸显自《蒙古秘史》以降潜藏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的原始神话思维,明确赋予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以各种神迹异能,进一步强化了神话化的书写模式。如《罗·黄金史》中,成吉思汗系佛陀涅槃 3250 年之后受天命再次降生人间。

在 17 世纪蒙古史学家们的笔下,成吉思汗被描绘成遵照佛祖释迦牟尼的旨令,背负拯救众生的使命,下凡人间,治理俗世的命定英雄,是孛儿只斤家族中唯一“享受天命的人主”。出于同样的良苦用心,这一时期的蒙古史学家们大胆运用艺术表现手法,或演义史实,例如把窝阔台、拖雷等儿孙后辈的事迹嫁接到成吉思汗身上;或以纯属虚构故事情节增强文本的说教力度,例如成吉思汗梦兆先知敌情、成吉思汗化身为白发长须的老人弯弓射箭训诫心怀不满的同胞兄弟等。甚至,在罗桑丹津的《黄金史》中,杜撰了合撒儿“酒席上曾抚摩忽兰合敦的手”等有悖人伦的臆说故事和叛逃闹剧,通过丑化合撒儿的形象,强调成吉思汗嫡系血脉的正统性,打压支系旁脉的觊觎。《蒙古源流》中亦如此:“却说,脱欢太师身骑米喇散的良种淡黄马,绕圣主[成吉思合罕]的官帐三圈儿,挥刀劈帐顶,说道:‘……现在全体蒙古人众都已成了我的[属民],我要按照从前蒙古历代皇帝的规矩建立帝号!’说完给圣主奉上了供物,转过身时,[只听]圣主的金箭筒‘啪!’地发出了响声,向那厢一看,[金箭筒]中孔内有一支鉃箭在颤动着。当即,脱欢太师的鼻子和嘴里冒出了鲜血,[他]慌乱不知所措。当有人给他脱下衣服,让他恢复知觉时,大家看见他的两个肩胛骨中间显出了箭痕。到主上的箭筒跟前去一看,只见中孔内有一支鉃箭的铁扣两边沾上了血迹。”^[5](247)]

三

神话式思维往往以叙述故事的形式,象征地表达着一种文化或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在生存生业的整体性活动中,人类依照理想概念和具体历史存在构成自身。综上所述,17 世纪的蒙古史学家们承继 13 世纪《蒙古秘史》的创作思维,甚至愈加凸显其蕴藏最深的神话思维,不遗余力地赋予历史人物成吉思汗以神圣光环,借以重构成吉思汗不可侵犯的伟大、神圣形象,意图振兴蒙古民族的文化精神,增强民族内部的凝聚力。他们的努力再次有力证明了文化学和世界史上颠扑不破的一条发展规律,即尽管由外部原因引发和催动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转型,但是其演进中所遵循的路线、所采用的范型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母体文化的脐带。正是 17 世纪蒙古史传文本在思维结构上借助神话—宗教思维,推动了成吉思汗形象从历史英雄升华为蒙古民族文化英雄、信仰英雄的历程,进一步强调、强化、巩固了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民族文化核心凝聚力的象征符号意义,在民族文化史上起到了巩固信仰的现实性效用。

参考文献:

- [1] 巴雅尔,标音.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 [2] [德]恩斯特·卡西尔.神话思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 [3] (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 (清)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M].呼和浩特:蒙古学出版社,1986.
- [5] (清)萨囊彻辰.蒙古源流[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李小凤】